

“天保之死”与《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阅读经验生成

摘要：本文从“天保之死”这一事件入手，讨论《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阅读经验如何在叙事过程中生成。文章认为，“美丽总是愁人的”并不只是阅读结束后被概括出的主题判断，而是在故事世界建构、事件扰动与读者回望重组中逐渐形成的审美经验。小说前半部分通过溪流、渡口、白塔、端午、歌声、人情往来和含蓄婚恋等因素，建构出一个可被读者进入、期待和依恋的茶峒故事世界；“天保之死”则作为关键事件，具有故事世界扰动与阅读经验扰动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将死亡、亏欠、沉默和隔阂引入茶峒原本仍可周旋的人情秩序，使傩送、船总顺顺、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关系发生失衡；另一方面，它也使读者此前形成的沉浸经验发生断裂，促使读者回望并重新理解边城世界的美。尤其是白塔这一空间形象，在开篇参与建构茶峒世界的稳定感，又在结尾的倒塌与重修中获得“愁人”的意味，集中呈现了阅读意义如何在前后照应中被重新组织。本文借助戴维·赫尔曼关于故事世界与世界扰动的叙事学思路、玛丽-劳尔·瑞安关于沉浸的分析维度，以及伊瑟阅读现象学的问题意识，说明关键事件如何在诗化叙事中使边城之美转向“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经验。

关键词：《边城》；天保之死；阅读经验；故事世界；世界扰动；悲剧诗学

一、研究视角与问题提出

闫晓昀在《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中指出，评论界常以“诗化小说”称谓《边城》这类富于诗性的作品，用以概括其由整体性情绪引导、以非线性叙事方式结构而成的弱情节化特征；但小说究竟如何被“诗化”，相关论述却常常语焉不详，容易停留在阅读体验层面的印象式阐释。为回应这一问题，闫晓昀将“意象叙事”视为沈从文实现小说诗化的重要方式，认为水、烟雾、虎耳草等意象并非单纯的抒情装饰，而是参与情节推进、心理呈现与氛围建构的叙事因素。¹不过，在肯定“意象叙事”这一思路的同时，“弱情节化”是否意味着情节和事件在小说诗化过程中无足轻重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本文的一个基本目标，正是以“天保之死”这一事件为切入点，考察它如何参与《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阅读经验生成。

赵学勇在《“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中，把“美丽总是愁人的”视为理解沈从文及《边城》的重要诗学命题。所谓“美丽总是愁人的”，指

¹闫晓昀：《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1页。

的是美本身包含着易逝、不可保有和难以固定的忧愁意味。赵学勇指出,《边城》并非单纯展示一个完满的牧歌世界,而是以现代叙事方式阐发“美令人忧愁”的生命体验,使作品超越普通爱情故事,进入对生命无常与人生悲剧的感受之中。²这一论述揭示了《边城》悲剧诗学的重要面向。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向阅读过程,关注“美丽总是愁人的”如何在读者进入、经历并重新理解边城故事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生成。换言之,本文关心的不是“美丽总是愁人的”作为完成后的主题判断,而是它作为一种阅读经验如何在叙事事件的作用下逐步形成。

为了展开这一问题,本文将借助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关于故事世界(storyworld)、世界建构(worldmaking)与世界扰动(world disruption)的叙事学思路。所谓故事世界,指的是读者在叙事引导下建构出的由空间、人物、事件、关系和价值秩序共同组成的世界;所谓世界建构,则指叙事通过选择、组织和强调不同材料,使一个可被理解和进入的故事世界逐渐成形;所谓世界扰动,则指某些事件将失衡、非惯常状态或不稳定情境引入这一世界,并为其中的人物所经验。³据此,“天保之死”首先可以被理解为茶峒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事件。它改变了傩送、顺顺、祖父和翠翠所处的人情关系,使原本尚可通通过礼俗、善意、歌声和等待继续周旋的婚恋问题,转化为死亡之后的亏欠、沉默与隔阂。

不过,本文并不止于说明“天保之死”在故事世界内部造成了何种失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文本内部的事件如何显现并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经验。换言之,本文将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与阅读经验中的断裂加以区分。前者发生在人物所处的茶峒世界之中,后者则发生在读者对这一世界的进入、期待、回望和重新理解之中。二者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紧密关联。作出这一分析性区分,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天保之死”如何参与《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阅读经验生成。

围绕“阅读经验如何生成”这一问题,伊瑟(Wolfgang Iser)的阅读现象学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视域。伊瑟在《阅读过程:一种现象学方法》中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等同于作者写下的文本,也不能等同于读者任意的主观感受,而是在文本结构与读者实现活动的交汇中生成。阅读意义也在期待、回顾、补充和修正的动态过程中逐步形成。⁴本文由此把“美丽总是愁人的”理解为一种在阅读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审美经验,而非阅读完成之后对作品主题的简单概括。在这一视域下,“天保之死”的关键性不仅在于它扰动了茶峒故事世界内部的人情秩序,也在于它促使读者重新回

²赵学勇:《“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

³David Herman,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p. 105-136.

⁴Wolfgang Iser,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in Ralph Cohen, ed., *New Directions in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 125-145.

望此前已经形成的边城之美。

要说明这种回望何以可能，还需进一步说明读者此前如何进入并依恋边城世界。为此，本文借用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关于沉浸的理论。瑞安在讨论叙事与虚拟现实关系时，将沉浸理解为读者进入文本世界并在其中形成参与感的过程，其中包含空间沉浸、时间沉浸和情感沉浸等维度。⁵本文将这三个维度作为描述读者如何进入边城世界的辅助概念。《边城》前半部分通过茶峒空间、节令风俗、歌声、渡口、白塔和人物关系，使读者逐渐形成对这一世界的感知、期待和情感投入。也正是在这种沉浸经验已经形成之后，“天保之死”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阅读经验中的断裂。

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为：“天保之死”作为文本内部的关键事件，如何从茶峒故事世界中的人情秩序失衡，转化为读者阅读经验中的断裂、回望与重组？围绕这一问题，第二部分将主要借助赫尔曼关于故事世界、世界建构与世界扰动的思路，分析《边城》如何建构出茶峒故事世界，并说明“天保之死”如何扰动这一世界内部的人情秩序。第三部分将在阅读现象学视域下，结合瑞安关于沉浸的理论，分析读者如何进入边城世界，以及“天保之死”如何使既有的沉浸经验发生断裂，并引发回望与意义重组。第四部分则讨论故事世界扰动与阅读经验扰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文本内部的事件何以能够参与“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经验生成。

二、边城故事世界的建构与“天保之死”对故事世界的扰动

要理解“天保之死”如何构成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首先需要说明《边城》如何建构茶峒故事世界。借用赫尔曼关于世界建构的思路来看，《边城》从既有地方经验、风俗经验、人情经验和婚恋经验中选择材料，并通过组合与分解（Composition and Decomposition）、加权（Weighting）、排序（Ordering）、删略与补充（Deletion and Supplementation）、变形（Deformation）等程序，将其组织为一个具有审美凝练性的故事世界。⁶正是在这一世界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情秩序和生活整体之后，“天保之死”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扰动事件。

首先，《边城》通过组合与分解，将现实湘西的地方材料重新组织为茶峒故事世界的基本构件。小说开篇由“四川过湖南去”的道路写起，继而写溪流、白色小塔、

⁵Marie-Laure Ryan,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2: 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5–114.

⁶David Herman,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p. 108–111.

塔下人家和撑渡船的老人，由此展开一个由道路、溪流、渡口、白塔和人家构成的地方空间。随着叙事推进，吊脚楼、河街、码头、端午赛船、河中捉鸭、月夜唱歌、渡船老人、翠翠、天保、傩送等要素相继出现，并被安置进同一个茶峒生活秩序之中。与此同时，小说并未把湘西作为完整的社会历史整体加以铺陈，而是从中抽取具有叙事功能和审美意味的部分。溪流、渡口、白塔、端午、歌声、渡船老人和少女翠翠被反复凸显，政治、经济压力和更尖锐的社会冲突则被压低。通过这种选择性的组合与分解，茶峒被建构为一个由风景、风俗、人情和爱情共同支撑的故事世界。

其次，小说通过加权，使某些元素在茶峒故事世界中获得更高的叙述分量。水、渡口、白塔、端午、歌声、祖父的慈爱、翠翠的羞怯、人情往来等因素，在小说中不断被重复和强调。水既构成茶峒的地理环境，也连接渡船生活、端午风俗和人物相遇；渡口既是祖父与翠翠谋生之处，也是茶峒人情往来的节点；白塔在开篇便与溪流、老人和人家共同构成边城空间的稳定标志；端午则把地方风俗、公共场景和翠翠与傩送的初遇组织在一起。小说并没有平均描写茶峒的一切，而是通过这些元素的持续加权，使茶峒首先呈现为一个清澈、温厚、可亲近的世界。

翠翠的形象也在这种加权中被建立起来。她在祖父身边长大，熟悉溪水与渡船，是山野溪流之间自然生长出来的少女。小说并不通过长篇心理独白解释她的内心，而是通过话语、动作和细节显出她对爱情的朦胧感受。例如翠翠夜里回来，祖父喊她，她却轻轻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这句话带有孩子气的嗔怪，也暗含青春情绪被触动后的羞涩。闫晓昀指出，《边城》中涉及鱼的对话频繁出现，几乎每段有关主人公情爱发展的场景都有鱼意象参与；从翠翠与傩送初遇时“大鱼来咬了你”的玩笑开始，“鱼咬人”“鱼吃人”的说法便逐渐与翠翠对傩送的朦胧情感发生关联，成为承载情爱意识的特定符码。⁷由此，鱼、水和少女情绪被叙事反复联系起来，使翠翠的情感经验嵌入茶峒故事世界的自然空间之中。

再次，《边城》通过事件排序，使翠翠的婚事在舒缓、含蓄和延宕中逐渐展开。小说前半部分并没有让爱情冲突迅速走向对抗，而是将其安置在端午相遇、托人说媒、月夜唱歌、“车路”与“马路”的选择、兄弟竞争以及碾坊诱惑等环节之中。天保的求婚属于“车路”，依靠媒妁、礼俗和家庭安排；傩送的歌声属于“马路”，依靠夜歌、等待和心意相通。这种排序使婚恋问题始终处在可以周旋的状态之中。祖父既想替翠翠打算，又不愿粗暴决定她的终身。翠翠听到大老做媒时，“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却仍低头剥豌豆，把豆荚抛到水中，看它们从容流去，自己也仿

⁷闫晓昀：《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0页。

佛从容了一些。这里的婚恋关系并未被处理为激烈的三角冲突，而是通过羞怯、试探、误会和沉默逐渐积累张力。茶峒故事世界的时间秩序，也由此呈现出含蓄、延宕和等待的特征。

此外，《边城》的诗化效果还来自删略与补充。小说有意压低现代社会的剧烈冲突，也很少把人物内心完全解释清楚。翠翠的情感并非通过自我剖白展开，而是通过沉默、嗔怪、脸红、低头、听歌和等待显露出来。叙事在许多关键处保留空隙，使人物关系并不被完全说透。正是这些空隙，使茶峒世界带有一种含蓄的诗意，并在风景、对话、歌声、沉默和误会之间留下可供感受的余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对现实湘西经验的处理，也具有审美变形的意味。茶峒并非脱离现实的乌托邦，而是现实地理、民俗和人情经验经过叙事凝练后的故事世界。白塔、溪流、渡船、端午和歌声既属于地方生活，也承担着组织世界感的作用，使茶峒成为一个可被感知、可被期待、也可被扰动的叙事空间。

总的来说，在“天保之死”发生以前，《边城》已经通过组合与分解、加权、排序、删略与补充以及审美变形，建构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茶峒故事世界。这个世界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翠翠的婚事、兄弟二人的竞争、碾坊的现实诱惑、祖父的试探和翠翠的迟疑，都已经在前半部分逐渐出现。然而，这些矛盾仍被包裹在茶峒的人情秩序之中，似乎仍可通过礼俗、善意、歌声、等待和解释继续周旋。而正因为这一世界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天保之死”才会成为真正的故事世界扰动。

“天保之死”首先扰动的是茶峒故事世界内部的人情秩序。在此之前，翠翠的婚事虽然牵涉天保与傩送兄弟二人，也牵涉船总家、渡船老人和王乡绅家的碾坊，但它仍处在可以协商、试探和等待的关系状态之中。天保可以托人说媒，傩送可以用歌声表达心意，祖父可以在礼俗与翠翠意愿之间小心周旋，顺顺也可以在家族安排与儿子选择之间权衡。这个问题虽存在张力，却仍处在茶峒既有生活秩序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

而天保之死改变了这一点。死亡把原本可以继续解释和周旋的关系，转化为无法撤回的生命损失。天保的死亡使所有人物都被卷入新的关系结构之中。对傩送而言，哥哥之死使他无法继续单纯面对翠翠，也无法再把自己的爱情理解为个人心意的自然展开。对船总顺顺而言，失子之痛使他难以继续以原来的人情方式面对渡船老人和翠翠。对祖父而言，他原本只是想替翠翠寻得一个妥帖归宿，却发现自己的善意、试探和迟疑被卷入无法补偿的人情裂痕。对翠翠而言，她未必完全理解事件的因果，却已经被卷入沉默、等待和失落之中。

因此，“天保之死”的扰动力量不在于它以强烈戏剧场面直接摧毁边城世界，而

在于它把死亡、亏欠、沉默和隔阂引入这个世界内部。茶峒原本依靠礼俗、人情和善意维系的关系结构，从此出现难以修复的裂缝。傩送的歌声不再响起，船总家与渡船老人之间的往来也无法恢复原来的轻松；祖父越想把事情说清，越显出语言在复杂人情面前的无力。翠翠仍然留在渡口等待，但她所等待的已经不是一个逐渐明朗的爱情结果，而是一个被死亡改变之后难以确定的回应。

这一扰动还改变了茶峒故事世界中若干核心元素的功能。水在前半部分连接渡船生活、端午风俗和翠翠与傩送的初遇，是地方空间和诗意氛围的核心元素。天保死于水上之后，水仍然属于湘西风景，却不再只是可亲近、可观赏、可居住的空间，也成为吞没生命、传来噩耗、制造阻隔的媒介。歌声在前半部分意味着召唤、试探和可能的结合；天保死后，歌声的停止则意味着无法明说的痛苦。渡口原本是人情往来的节点，也逐渐转化为翠翠等待与命运悬置的场所。白塔原本标示茶峒世界的稳定感，后文的倒塌则进一步显出这种稳定感已经被动摇。

由此可见，“天保之死”并不是从外部破坏边城世界的戏剧事件，而是在已经形成的茶峒故事世界内部引入一种难以消化的失衡。它使原本可以由礼俗、善意、歌声和人情往来慢慢调停的婚恋关系，转化为死亡之后的亏欠、沉默与隔阂。天保之死发生后，傩送的沉默、船总顺顺的失子之痛、祖父的焦虑和翠翠的等待彼此牵连，逐渐把茶峒故事世界推向更深的失落。至此，本文所说的“世界扰动”首先表现为故事世界内部秩序的扰动。至于这种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如何进一步转化为读者阅读经验中的断裂、回望和意义重组，则有待在下一部分继续说明。

三、从故事世界扰动到阅读经验断裂：“美丽总是愁人的”如何生成

上一部分已经说明，“天保之死”首先是茶峒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它将死亡、亏欠、沉默和隔阂引入原本仍可周旋的人情秩序，使傩送、船总顺顺、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关系发生失衡。第三部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为何会在读者那里形成阅读经验的断裂。换言之，本文接下来关注的，不再只是“天保之死”改变了茶峒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这一事件如何改变读者此前对边城世界的感知方式，并由此参与“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经验生成。

梅洛-庞蒂关于阅读中“被唤醒”的说法，可以作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入口。他曾指出，读者有时会被几个词突然唤醒，原先看似普通的词语、形式和句法也会把读者卷向新的意义。⁸放在小说阅读中看，由语言、场景、事件和人物关系共同组织出

⁸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载《梅洛-庞蒂文集》第8卷：《眼与心·世界的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17页。

来的关键节点，同样能够唤醒读者。《边城》中的“天保之死”尽管没有以强烈戏剧高潮的方式突然中断叙事，却使读者意识到，前文那些清澈、自然、温厚的边城景象，已经不能再被单纯理解为牧歌式美感的组成部分。

而这种“被唤醒”的阅读经验并非凭空发生。读者之所以会在“天保之死”之后感到边城之美发生转向，正在于小说前半部分已经建构出一个可供进入、期待和依恋的茶峒故事世界。换言之，上一部分所分析的世界建构，并不只是在文本内部组织空间、风俗和人物关系，也为读者的沉浸经验提供了条件。瑞安关于沉浸的理论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她在讨论叙事与虚拟现实关系时，将沉浸理解为读者进入文本世界并在其中形成参与感的过程，其中包含空间沉浸、时间沉浸和情感沉浸等维度。

9

在《边城》中，空间沉浸依赖于茶峒地方世界的反复成形。溪流、渡口、白塔、吊脚楼、河街和码头等要素，使读者能够在阅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感。时间沉浸则来自端午、月夜唱歌、说媒、等待等事件的延宕性组织，使读者追随翠翠婚事逐渐展开的时间进程。情感沉浸则来自人物关系的温厚展开。祖父与翠翠的相依、翠翠对傩送的朦胧情意、天保的直率与傩送的谦让，共同使读者对这个世界形成情感投入。由此可见，《边城》前半部分的世界建构，同时也是读者空间沉浸、时间沉浸和情感沉浸逐渐形成的过程。阅读经验中的断裂并不单纯来自死亡事件本身，而来自死亡进入了一个读者已经熟悉并依恋的故事世界。正因为读者已经在这一世界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感受和期待，“天保之死”才会使此前的沉浸经验发生动摇，并使边城之美显出裂痕。

如果说“天保之死”使读者此前形成的沉浸经验发生断裂，那么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断裂如何继续作用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伊瑟的阅读现象学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伊瑟指出，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本本身，也不等同于读者任意的主观感受，而是在文本结构与读者实现活动的交汇中生成。阅读意义总是在期待、回顾、补充和修正的动态过程中逐步形成。¹⁰《边城》中“天保之死”的意义也并不是事件发生时一次性完成的。它要求读者回过头重新理解此前的端午相遇、月夜歌声、“车路”与“马路”的选择、翠翠的羞怯和祖父的试探。此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爱情逐渐展开的可能性；天保死后，它们又被重新纳入死亡、亏欠和误会的结构之中。阅读因此发生回顾性的重组。

⁹Marie-Laure Ryan,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2: 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6.

¹⁰Wolfgang Iser,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in Ralph Cohen, ed., *New Directions in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 125–145.

在这一回望过程中，白塔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贯穿小说开端与结尾，最能显示阅读意义如何在前后照应中发生改变。小说开篇写溪流、白色小塔、塔下人家和撑渡船的老人，白塔最初并不以明确象征物的方式出现，而是与溪水、渡口、老人和翠翠共同构成茶峒世界的稳定空间。它的意义并非一开始就被规定为悲剧象征，而是在后文事件的推进中逐渐改变。“天保之死”启动了茶峒人情秩序的连续失衡。哥哥之死使傩送陷入沉默，船总顺顺与渡船老人之间产生隔阂，祖父越想解释，越无法修复已经形成的人情裂缝。随后，祖父之死使翠翠失去最直接的亲情守护，白塔倒塌则将这一系列失衡集中到空间形象之中。

开篇的白塔参与建构边城世界的安稳感，结尾的白塔则在倒塌与重修中显出这种安稳感的破裂。读者回望小说开端时，会发现最初那个看似平静的空间标志，已经被“天保之死”以后的一连串事件重新赋义。白塔的倒塌意味着边城世界原有秩序的崩塌，而白塔的重修，并非重建了安稳。它是一种带着创伤记忆的修复——就像读者在经历阅读断裂后，无法再天真地回到最初的沉浸。重修的白塔是一座纪念碑，既标志着美的存续，也铭记着美的失去。它将“美丽”与“愁人”永久嵌刻在茶峒的风景里，成为阅读经验最终凝固成的那个含混而深刻的意象。

“天保之死”并没有立即完成“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经验，而是启动了此后连续展开的失衡过程。傩送的沉默、顺顺的隔阂、祖父的焦虑、翠翠的等待、祖父之死和白塔倒塌彼此牵连。前半部分的美并未被后半部分的悲剧取消，而是在死亡与等待之中被重新规定。读者此时再回望端午、渡口、溪流、歌声和白塔，会发现它们既曾共同构成边城世界的美，也在后文的断裂中显出这种美的易逝和难以保有。

综上所述，“美丽总是愁人的”并不只是读者在阅读结束后外加给《边城》的主题概括，亦是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审美经验。小说前半部分通过空间、节令、风俗、人情和爱情，使读者进入并依恋茶峒故事世界；“天保之死”则作为故事世界内部的扰动，在读者经验中形成断裂；随后，读者在回望、补充和修正中重新理解白塔、渡口、歌声和翠翠的等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边城之美显出其悲剧意味。事件不是诗化叙事的反面，而是诗意发生转向、沉浸发生变质、阅读经验发生断裂与重组的机制。

四、结语：从故事世界扰动到阅读经验扰动

由“天保之死”出发，本文试图说明，《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并不只是一个在阅读结束后被概括出的主题判断，而是在故事世界建构、事件扰动与读者回望

中逐渐生成的审美经验。按照赫尔曼对世界扰动的理解，叙事中的某些事件会将失衡、非惯常状态或不稳定情境引入故事世界，并为其中的人物所经验。¹¹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天保之死”并不只具有故事世界内部的意义。它具有一种双重扰动性：一方面，它扰动了茶峒世界内部的人情秩序，使傩送、船总顺顺、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关系进入死亡之后的亏欠、沉默与隔阂；另一方面，它也扰动了读者此前在阅读中形成的边城世界感，使原本被感知为清澈、温厚、可依恋的世界，开始显出失衡、裂痕与不可挽回的悲剧意味。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双重扰动并不意味着文本内部事件与读者阅读经验可以被截然分开。故事世界不是独立于阅读之外的现成对象，阅读经验也不是读者在文本之外任意附加的主观感受。《边城》的茶峒世界，是在叙事组织与读者实现活动的交汇中形成的。“天保之死”的扰动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先在文本内部完成、随后被读者被动把握的事实；同样，它也不是读者单方面把一个死亡事件解释为世界扰动。“天保之死”既作为故事事件改变人物所处的关系结构，也作为阅读事件改变读者对此前边城之美的感知方式。

就《边城》而言，这种双重扰动之所以成立，在于小说前半部分已经完成了充分的故事世界建构。溪流、渡口、白塔、端午、歌声、人情往来和翠翠的情感经验，共同组织出一个可被读者进入、期待和依恋的茶峒世界。读者在其中形成空间沉浸、时间期待和情感投入。当天保之死发生时，读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死亡事件，而是一个已经被其进入的世界发生了失衡。死亡因此不只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改变读者对前文诸多因素的理解。端午、歌声、渡口和白塔不再只是牧歌式美感的组成部分，而在回望中显出易逝、脆弱和不可保有的意味。

由此也可以重新理解《边城》的诗化叙事。诗化并不意味着事件功能的消失，弱情节化也不意味着情节结构失效。在《边城》中，关键事件亦在诗化叙事内部发挥作用。“天保之死”没有被处理为强烈的戏剧高潮，却启动了此后连续展开的失衡过程。傩送的沉默、顺顺的隔阂、祖父的焦虑、翠翠的等待、祖父之死和白塔倒塌彼此牵连，使读者不断回望并修正此前形成的边城世界感。尤其是白塔这一意象，在开篇参与建构茶峒世界的稳定感，又在结尾的倒塌与重修中获得“愁人”的意味。它显示出，《边城》的悲剧美感并非外加于美丽世界之上，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由事件、回望和意义重组逐渐生成。

总结来说，“天保之死”能成为《边城》“美丽总是愁人的”阅读经验生成的关键，是因为它在已经被建构并被读者沉浸其中的故事世界内部发生。它既是茶峒人

¹¹David Herman,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133.

情秩序的扰动，也是读者审美经验的扰动。故事世界内部的失衡与阅读经验中的断裂，在阅读过程中彼此关联、相互实现。由此可见，在诗化小说中，事件并不只是推动情节的单位，也可能是重新组织读者感知结构的机制。《边城》的诗意正是在这样的事件性转折中，由边城之美转向“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经验。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边城》，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年。
2. 赵学勇：《“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 9 期。
3. 闫晓昀：《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4. 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载《梅洛-庞蒂文集》第 8 卷：《眼与心·世界的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
5. David Herman,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6. Marie-Laure Ryan,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2: 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Wolfgang Iser,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in Ralph Cohen, ed., *New Directions in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 125–145.